

毛泽东、内部参考与当代中国的政治传播

刘宪阁

内容提要 在勾勒整个当代中国新闻史的版图布局时，政治传播实亦居于重要位置。而作为中国特色传媒体制和政治传播重要组成部分的内参，尤不容忽视。不过对这种在当代中国社会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的内参报道及其机制，除个别海外及港澳台地区学者在相关考察中有所涉猎外，国内尚少较为深入的研讨，多为笼统的现象描述。以毛泽东如何在一些内政外交活动中运用内参资料为例，对当代中国新闻史上这一独特的政治传播现象略做尝试性梳理和考察，可为进一步研讨提供参照和镜鉴。

关键词 毛泽东 内部参考 政治传播 当代中国

熟悉当代中国传媒生态的人都知道，在我们日常的社会政治生活中，有一种极富特色的新闻报道形式，即内参报道；而这些内参报道背后所体现的一整套新闻传播机制，亦可谓极富特色的中国新闻传媒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说在整个当代中国新闻史的版图布局中，政治传播实亦居于重要位置，^[1]那么，作为中国特色传媒体制和政治传播重要组成部分的内参，尤不容忽视。^[2]惟对这种在当代中国社会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的内参报道及其机制，除个别海外及港澳台地区学者在相关考察中偶有涉猎外，^[3]国内尚少较为深入的研讨，而多为笼统的现象描述。^[4]因此对内参的历史渊源、角色演变、运作过程及功能机制等虽亦有所揭示，但总体看可以说还不是很清楚。本文拟在有关资料基础上，以毛泽东如何在一些内政外交活动中运用内参资料为例，对当代中国新闻史上这一独特的政治传播现象略作尝试性梳理和考察，以为进一步研讨提供参照和镜鉴。

一、“甚为有益”的材料：毛泽东与内部参考的创设和演进

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人逐渐摸索和创造出内参报道这样一种独特形式，并逐渐形成一套制度。1948年6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新华社应供给各种资料的指示》，通常认为这是第一个关于内参报道的文件。1949年9月22日，新华社正式出版《内部参考》，刊登记者反映的国内外重要情况，供中央领导同志参阅。1952年1月，为办好这一内部刊物，新华社向内参读者发出征求意见表。毛泽东是这样填写的：“我认为此种内部参考材料甚为有益。凡重要者，应发到有关部门

和有关地方的负责同志，引起他们注意。各大区和各省市最好都有此种内部参考，收集和刊印本区本省本市的内部参考材料。”^[5]

但记者为《内部参考》写的稿子往往被地方扣压，为此，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指出：“中央给记者的任务就是如实反映情况。记者反映情况是自己的职责。不论是省市委喜欢的不喜欢的，他都要反映。中央怎样判断，这是中央的事。省市书记不是记者，不能到处去采访，如果让他任意扣压记者的稿件，中央还要派记者下去干什么？”^[6]

在此前后，胡乔木亦代表毛泽东，多次就内参报道向新华社传达意见。比如有些稿件可以而且应该公开发表，不必都登在内参上。因为当时正在提倡批评与自我批评，胡乔木指出如果连这类新闻也不公开报道，就会让人感觉“我们对于像这一类工作缺点也是不愿揭发和批评的”。至于内参中提到的偏向、缺点和问题，他提出务请有关机关进行答复，并在稿末注明已于何时向何机关提出。有关机关的答复也应登在内参上。总之，要“改变一切工作缺点不能公开报道的观点”。同时对各种工作中的缺点偏差不应只是消极地揭发，而应积极地追查纠正；不仅要向中央提供工作中的不良情况，还要负责地帮助中央追查并及时提供改进的情况。^[7]

1953年7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新华社记者采写内部参考资料的规定》。作为“消息总汇”，新华社要“充分地、及时地、精确地报道对人民群众有教育意义，对实际工作有指导或参考意义的新事物、新情况、新人物和新经验”。同时，由于新华社记者分布较广，可以并应当利用他们的便利条件，“反映工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缺点和群众的思想情况，供给中央负责同志参考”。因此，除发行通讯稿，并根据国外通讯社资料编印《参考消息》外，新华社还编印《内部参考》。后者曾大量地、及时地反映了各方面、各地区许多重要情况和问题，但也有不少缺点。为此，《规定》提出一些调整。比如关于采写参考资料的要求，关于记者与地方，以及记者和总社的关系等也有所规定。

更重要的是，重新规定了采写范围。即1. 党的政策方针在各地贯彻执行中的情况和问题，特别是那些对领导机关“有参考价值的实际工作中的困难、偏向、错误和缺点的情况”；2. 各阶层人民当前的政治思想情况、对国内外重大政治事件的意见，以及生活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对于领导机关的意见；3. 统一战线工作中的问题；4. “工作中一些尚不成熟、带试验性的不宜公开报道的工作经验”；5. 各地自然灾害的详细情况和反革命分子的活动情况；6. “其他不宜于公开发表的重要情况”。^[8]

为贯彻执行上述规定，新华社国内新闻编辑部于1953年8月29日召开部务会议进行讨论。会议认为各地对采编工作已较过去重视，但仍存在不少缺点，为此提出一些针对性意见。明确编辑《内部参考》的目的，“主要是供给中央负责同志参考，使他们能及时地了解到党的各项政策在具体执行中所发生的新的重大问题”（同

时也为新华社组织报道提供情况)。另外强调作公开报道是记者的主要任务,“把在采写公开报道中所了解的不便公开报道的重要情况和问题及时写成资料也是记者的任务”,这两者是完全可以结合起来的。对于某些特殊重大的事件,也可派专人去采访写成资料。不过也有记者担心这不算工作成绩,甚至也没有意义,为此会议确定:写内参资料也有意义,也算工作成绩,应和作公开报道一样认真负责。^[9]

到1957年底,内参工作已有所进展,但也遇到不少新情况。比如刊登了一些有问题、有错误或不宜在“内参”上刊载的稿件,同时稿件质量和数量也有日益下降的趋势,甚至连续有好几期由于来稿很少而脱期。为此,编委会重新确定了一些基本原则。即“内参”主要是供中央负责同志了解国内外各方面情况的一个党内刊物,选稿标准应该从宽,因此,“只要是对中央负责同志有参考价值的一些国内外重要资料,即应有选择地加以刊载,不宜限制过严”。另一方面,内参的阅读范围较广,不限于中央负责同志,所以选登稿件也应有所限制。一般说来,“国际稿件刊登从严,国内稿件刊登从宽;在选择国际稿件时,对反映兄弟党内部关系的稿件从严,对反映一般国际问题和兄弟国家内部一般情况的稿件(如经济建设中的问题、学术思想动态、人民生活 and 思想情况等)从宽”。

提出国际稿件的问题,亦非毫无理由。比如1957年8月26日就刊登了关于保加利亚共产党的一些传闻,还刊登了一些在兄弟国家中流传的“反动的政治笑话”。编委会认为,这些资料没什么参考价值,传出去“影响又非常恶劣”,不宜在“内参”发表。另外,西方资产阶级报刊和通讯社制造的关于社会主义国家的纯属污蔑的谣言,以及对我国及兄弟国家党和政府领袖私生活的污蔑,亦不宜在“内参”发表。

有鉴于此,除了原定国内稿件的六条范围,又提出国际稿件的五大范围:1. 不能或不宜公开发表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情况;2. 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的情况和活动,但机密的材料不登;3. 和平中立国家的政治经济情况、外交动向和重要政治人物的动向和分析;4. “中国人民对外活动的一些情况以及活动中接触到的不宜公开发表的材料”;5. 资本主义国家报刊通讯社针对社会主义国家的重要宣传,凡足以反映敌人注意什么、希望什么或是能说明敌人宣传动态的材料。但“纯属诬蔑谩骂的不登”。^[10]

1958年2月24日上午,中央书记处开会讨论《内部参考》的工作。邓小平指出,那上面登出来的东西有影响,对处理国外问题的稿件要特别慎重;搞错了,流传出去就会影响到国际关系。他并称,《内部参考》上面“反映的问题可信不可信”。胡乔木也认为,党内的组织问题不必在内参上发表,搞错了影响很大。彭真则指出:以后凡不宜在《内部参考》刊登而有参考价值的稿子,除打清样送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外,还应分送给中宣部、中联部、外交部。列席的新华社负责人缪海棱反映了记者因为怕出问题而不敢写内参的情况,彭真说

这不对，应鼓励记者写，但要认真负责。他还说，中央的一致意见，是要新华社认真地把《内部参考》办好。^[11]

1957年《内部参考》每期发行2310份。阅读范围也是比较严格的，“但实际阅读者却远远超过了规定的范围”。从读者来信可知，不少读者是地委级的干部，一些干部学校的次要干部、一般作家都可以看到“内参”。^[12]

到1959年，《内部参考》发行已达2400份。这是因为阅读范围扩大了，而且领导同志大都是一人一份，还有内参随着人走的现象（即工作调动后仍继续订阅）。为此，新华社后来决定采用中央分发文件的办法，在发行份数上加以适当控制，除中央负责同志可以一人一份外，一般以党组为单位，发给一份或若干份。新华社还就阅读内参的若干注意事项进行了规定。比如“明确《内部参考》是供领导同志阅读的党内文件，不得给规定阅读范围以外的干部阅读”。再如，阅读者工作调动，应由该机关机要秘书通知新华社发行科停发，不得自行处理或带走等。^[13]

还有一种重要的内参即《参考资料》。到1954年10月，新华社抄收的外国通讯社电讯已由1949年的30多家增至46家，每天收讯56万多字。原来编印的《参考消息》每天由1949年时的10多页，增加到50多页，刊物越来越厚，但还有许多译稿登不进去。吴冷西等认为，既然容纳不了日益增多的译稿，也不能再“膨胀”下去，有必要另办一个刊物，来满足中央有关部门和研究单位的需要。与此同时，周恩来也在思索怎么解决这个问题。1955年初，他指示改进和精编《参考消息》，并倡议出版《参考资料》。吴冷西立即同有关部门研究落实，并于2月21日呈送报告及方案，提出分成两种刊物出版。随后经周恩来批准，于3月1日起实行。从此，就有了新创刊的、后来俗称“大参考”的《参考资料》，和改版的、俗称“小参考”的《参考消息》。^[14]

1957年1月1日起，《参考资料》再次改版扩大发行，并由每天出版两期增加成三期，即上午版、中午版和下午版，共约16万字。增加了数量，加快了时效，新华社内部当时称之为“一日三参”。中央一些职能部门的读者则以满意的口吻说：“一日三餐（参），供应及时”。

1958年炮击金门期间，由于《参考资料》编辑粗糙，未能完全反映当时国际上对此问题的形势。10月24日，毛泽东派秘书林克来新华社传达他的批评意见，要求编辑人员“学习党的政策”。新华社的检讨送上去后，12月23日，^[15]胡乔木又专门来新华社传达中央常委的意见，要求成立“首先为中央服务”的专门的“参考材料编辑部”，成立一个“具有研究性质、为中央各作战单位提供参谋意见”的编辑部。这个意见，推动了参考报道在新华社内成为一个专业的报道系统。以吴冷西为首的编委会经过多次讨论和准备，于1959年2月16日正式确定成立参考资料编辑部，“以便在国际参考报道中为党中央和有关部门更好地起到‘耳目’作用”。^[16]

二、“每天必看”的内参：毛泽东借此了解各地情况，推进新三反运动

1959年3月，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说：“现在的报纸我只看一些消息，但《参考资料》、《内部参考》每天必看。”^[17]《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就有41篇关于《内部参考》的批示，显见这是他了解各地情况相当重要的渠道之一。^[18]毛泽东如此重视这一刊物，他又是如何运用《内部参考》，各级领导干部又是如何解读和响应那上面的一些报道的呢？不妨以1953年初的新三反运动为例来看一下。

还在1952年11月，毛泽东就收到中共山东分局的一份报告，内称区乡等基层干部中强迫命令、违法乱纪现象严重，省的领导机关也存在官僚主义等问题，除了姑息迁就下级干部，还积压了七万多件人民来信没有处理。^[19]毛泽东随即安排在1953年1月5日发布《关于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的指示》，除了将山东分局的报告转发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委、地委和县委之外，更号召这些单位要仿照山东的办法，从处理人民来信着手，检查一次官僚主义、命令主义、违法乱纪分子的情况，严重者须加惩处或清除出党。^[20]新三反运动由此开始。毛泽东更在13日将山东分局的报告直接转给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高岗、彭德怀、邓子恢、邓小平等，提示他们中央也可能有官僚主义，要求重视该问题。^[21]

但是直到1月底，各中央局、省委及市委都没有做出进一步的响应及自我检查的报告。毛泽东也无法从正式信息渠道获取各地官僚主义的实情，以及进行新三反运动的情况。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他作为读者于1月16日填写新华社的征求意见表时，表达了前引对《内部参考》的意见，即“此种内部参考材料甚为有益”等。可以看出，毛泽东希望借助内参来揭露各地的官僚主义问题，这样既可以让有关干部知晓情况，也使他可以借此了解各地动态。这种意图在如下事件中反映得更为明显。

1月30日，《内部参考》刊登了一篇《河北省农村基层干部违法乱纪情况严重》的报道。这是河北省委书记林铁安排新华社河北分社调查后做的。毛泽东看后很兴奋，随即责令新华社总社指示各省市分社照此办法，设定“官僚主义”、“命令主义”、“违法乱纪”等采访主题，并将其中的典型通报各中央局、分局、省委和市委，促请他们注意。^[22]诚如有研究者注意到的，这个指示隐含了两点：一是希望各省市书记像林铁一样，亲自领导检查各地的官僚主义，“省委带头，亲自领导”；二是可以通过阅读《内部参考》上各地新华社记者调查的结果，来了解各地的情况，获取比正式报告中更多的信息。

毛泽东一声令下，新华社立即布置各地分社重点采访。比如东北总分社就派出两个记者到干部强迫命令、违法乱纪现象较严重的热河、辽东两省采写相关消息，西北总分社也指示记者立即与有关机关取得联系，了解各省市中干部官僚主义、命

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情况及其严重程度，并了解各省市接到中央1月5日指示后的动态。中南总分社则布置记者重点采写经济工作方面领导机关的官僚主义、农民区乡干部的强迫命令作风，以及公安人员和民兵的违法乱纪事件。^[23]

在这种全面动员、重点采写下，到3月31日，《内部参考》刊出31篇相关报道。有的是各省进行全方位的检查，如陕西、江苏、湖南等；有的则以单一地区干部为揭发对象，如辽东庄河县、辽西朝阳县、四川万县等。归纳起来，这些报道反映的情况有几个特点：1. 强迫命令在基层干部中很普遍；2. 违法乱纪以基层干部打人为最普遍；3. 高级干部则以官僚主义态度最为普遍，包庇下属或是对批评者打击报复的情况不仅陕西有，江苏、湖南等地也有。

这些报道引起各地省委的注意，随即派人进行调查处理，并将结果刊登于《内部参考》上。以江苏为例，2月25日《内部参考》刊出《江苏各地干部中官僚主义和违法乱纪的情况》，指出人民来信未处理、假造情况上报、对批评者打击报复、部分区以下干部存在强迫命令等恶劣行为等六大问题。^[24]江苏省委随即对上述问题进行了检查和处理，并于3月23日将报告反馈给新华社；3月31日，《内部参考》刊出了这份报告。其中谈到从各单位抽调40余名干部，组成省委处理人民来信办公室，推动了相关工作，并有力配合了三反斗争。另有33个县市也建立了人民来信办公室。报告还汇报了其他问题的处理情况。^[25]

新三反运动中，毛泽东寄望于《内部参考》的，不仅是揭发干部中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违法乱纪，似乎还包括它能长时间扮演更积极的角色。这个意图在前述1月16日对《内部参考》的意见中已有所暗示。他希望“凡重要者，应发到有关部门和有关地方的负责同志，引起他们注意”，借此来监督有关部门和领导干部。可注意的是，仅1953年上半年《内部参考》就刊出了29封各单位响应揭发问题的来信，且都集中于2月到5月之间，这种数量和集中程度在《内部参考》中是非常罕见的。

这些单位包括了省部级和中央单位，但问题的发生却是工厂、工地、县乡镇等基层单位，可见一旦问题被《内部参考》揭发，就必须由直属的最上级单位来检查。此外，来信开头一般都有“×月×日你社（指新华社）转来……一事”等字样，且×月×日的时间与《内部参考》的刊载时间完全相同，由此可知当新华社刊载此问题时，也会发一份报道给该负责单位，促请其注意。而这正是按照前引毛泽东1月16日的相关意见来进行的。

不难发现，《内部参考》成了毛泽东了解情况的非正式沟通渠道之一。他先把自己想知道的情况如官僚主义、违法乱纪等通知新华社，再由新华社具体编成采写计划，要求各分社及记者站针对这几个主题进行采访，然后将报道刊登于《内部参考》上，这样就可以了解比正式渠道更多的信息。《内部参考》由此成为毛泽东乃至中共中央非正式信息沟通渠道的一环，甚至也成为监督体系中不可或缺的角色。^[26]

三、“世界局势将有变化”：毛泽东称内参是可以增进国际知识的教材，并作为制定外交决策的参考

内参资料不仅可以帮助处理内政，对因应国际问题亦很重要。毛泽东就多次表示，自己懂一点国际知识，靠的就是每天两本的《参考资料》。他不但自己看，还设了专门秘书帮他看。原为《参考消息》编辑组组长的林克，就在1954年被调去做帮毛泽东看参考报道的秘书。江青也任过此职。在相关档案文献中，留存了一些毛泽东给江青写的便条，要她注意阅读或研究某篇参考报道。

毛泽东阅读内参资料非常认真仔细。重要之处总是划线或圈点；有疑问的地方则打问号或写下质疑；有差错还认真地予以修正；对一些有重要参考价值的文章，则作眉批旁注，并推荐给其他领导或身边工作人员阅读。在这些批注中，毛泽东的立场观点和对问题的观察，跃然纸上。以1958年9月24日下午版《参考资料》为例，有20篇文章他看后做了眉批旁注，文内留下密密麻麻的圈圈点点和有长有短的杠杠线线。如在《梅农说联大未充分讨论我代表权问题是违反世界大多数人民愿望的行为》的标题旁批注：“极好！要看。”对《阿登纳认为现在只有苏美两个大国有一天中国将加入大国行列》一文，他批注：“值得看！！”对《美联社说美在联大阻挠对我代表权问题的讨论甚为孤单》一稿，他批注：“极重大，值得看。”对《美联社透露美企图利用中美会谈阻挠我解放台澎金马这一阴谋如不得逞就打起联合国招牌来干涉我国内政》一稿，批注：“这是一篇极重要的文章，值得看。”^[27]

又如1958年11月，看了李普曼写的《苏联的挑战》一文，毛泽东批示：“此件印发，值得一看。”^[28]1958年12月，中共八届六中全会期间，他又将《参考资料》上刊登的三篇报道，亲自重做标题、重写提要，批示邓小平印发给与会中委阅读。^[29]

对一些有助于了解世界形势、认清对手政策意图的参考报道，毛泽东常常批示在更大范围的报刊登载，或者作公开报道。比如1950年12月28日，他批示“可将胡佛演说以资料名义刊于人民日报第四版及世界知识上”。^[30]1953年2月28日，看到《内部参考》上台湾媒体关于华东等地军力部署的报道，他立即写信给新华社：台湾大道通讯社的两条消息，可移载《参考消息》，这是蒋介石向美国人说的，表明他无力进扰大陆和海南岛，和近几个月前蒋介石向美国通讯社发表的谈话为同一性质。^[31]1959年4月5日，《参考资料》刊出《印度新闻社报道西藏叛乱情况》和《印度新闻社记者报道西藏叛国分子谈几年来准备发动叛乱情况》，毛泽东在这两篇报道的目录旁边批以“可阅”，并指示：“即送周恩来阅。这个新闻社的这两条报道，是不利于尼赫鲁的，我看可以全文发表，请与吴冷西一商。”^[32]

毛泽东一直把《参考资料》作为他增加知识的重要“教材”。1971年到外地巡视途中对各地负责人谈话时，他说：“我天天当学生，每天看两本《参考资料》，所

以懂得点国际知识。”周恩来1972年8月1日在人民大会堂对各部门负责人讲话时也谈到：毛主席说，“他要学点新知识，主要靠两本《参考资料》”。^[33]

毛泽东多次指示要尽量多地收集外部世界各方的情况，特别强调向中央提供参考报道要全面，正的反的、好的坏的都要反映。他很重视外界和我们唱反调的言论。比如1957年6月24日《参考资料》选刊美国《新共和》杂志的一篇文章，他看后在给陈云的批语中写道：“17页有一句话，值得研究一下。这一句话是唱反调的，但也应当促使我们注意。”^[34]

1958年炮击金门期间，《参考资料》每天刊登的材料数量很大，毛泽东都仔细阅读看，认真研究。他发现编辑对稿件的处理和标题不符合中央方针政策，几次提出批评。10月初，毛泽东在中南海的住处连续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台湾海峡局势。会议期间，常委们还议论了《参考资料》的报道工作。据列席的吴冷西传达，常委会议提了四点意见：一、中央要消息灵通，《参考资料》应尽快向中央提供最新情况；二、编辑人员不了解有关的中央政策，应好好学习；三、编辑人员要研究情况，抓风向；四、编辑人员要客观，不要主观，要把情况原原本本地反映给中央，由中央判断。^[35]

读了《参考资料》上的信息后，毛泽东会有所思考，甚至形成决策。这些决策当然不是靠一两条参考报道就能作出的，但也不是说个别参考报道对决策没有起过作用。比如1964年10月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一直等到外国通讯社报道瑞典地震台测出中国西北地区有震感，周恩来才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一个集会上正式宣布。这天新华社社长吴冷西就守在收讯机旁看收到的外电，副社长朱穆之成了通讯员，负责传递有关信息。这个故事说的虽是新闻宣布的时机，但也算是一种小的具体的决策。^[36]

《参考资料》等报道还会影响毛泽东等高层领导对国际形势的评估。从新中国成立到他去世，随着国际形势的演变，毛泽东至少作出过三回不同评估。虽然不仅是根据参考报道提供的信息作出的，但是起了作用是毫无疑问的。^[37]有时候《参考资料》上的一些信息也确实促成了他的重要决策。典型者如1958年炮击金门前后的情况。毛泽东说这是对美国实行“绞索政策”，不会引发战争，是把美国“在台海套上绞索”，而且“套上了”。^[38]

炮击金门后，是“固守金马”，还是“划峡而治”？在这个问题上，美蒋态度不同：杜勒斯骂蒋“愚蠢，不明智”，蒋介石则指其声明为“片面”。从《参考资料》上看到这些情况，毛泽东立即改变方针，利用美蒋矛盾，以国防部长彭德怀的名义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先是暂停打炮七日，继而单日打炮、双日停止射击，任蒋军补充给养，而“美国军舰护航，不在此例”；声明又揭露美国“划峡而治”是为了“孤立台湾”、推行“两个中国”的阴谋，呼吁台湾当局看穿美帝阴谋，接受我方提出的和谈建议。^[39]

1958年11月19日,《参考资料》发表了杜勒斯一篇演说全文,题为《杜勒斯叫嚷在台湾海峡地区继续搞“不依靠武力”阴谋,为此甘冒“战争或疏远朋友”的危险,惊呼对社会主义和独立运动的发展不能“防御”,须加紧颠覆和干涉》。毛泽东看后觉得不妥,就提笔把标题改了,并印发中共八届六中全会。改后的标题为:

杜勒斯对国际形势的全面分析

——唱低调

——自己认输,说是在理论方面、组织纪律方面,西方不行

——招呼我们说:只要你们共产党埋头去办家里事,不出远门,西方就放心了。^[40]

1959年2月2日,《参考资料》又刊登了一篇杜勒斯以“如何抵挡共产主义”为主题的演说全文。毛泽东看后在旁边写下了一段“读后感”。原文如下:“畏战争、畏革命,想要维持现状。如果出现革命,那是不合所谓正义和平的,应当立即以战争去扑灭。如果出现战争,也是一样。扑灭革命和革命战争,永葆资本统治,这是杜勒斯的目的。帝国主义者已基本上转到维持现状的立场。”^[41]

1960年夏季,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工作会议,毛泽东又从内参刊物中选出两组文章,作为参考文件分发给会议参加者。一组选自《参考资料》,是关于西德总理阿登纳和法国总统戴高乐秘密会谈的印发批语是:“请各同志注意看下面这些消息。世界局势将有变化。请你们看一下,想一下,议一下。”另一组选自《内部参考增刊》,批语是:要所有各同志,将该刊“第X期10篇文章全部精读一遍,对其中几篇最重要的,要读两遍。然后,各小组认真讨论一天。讨论时中央各部长都参加”。^[42]

通过《参考资料》等内参报道,还可以检验一些方针政策的执行效果。毛泽东曾与英国退休元帅蒙哥马利谈话。蒙氏回国后,在《星期日泰晤士报》发表了一系列访华观感,《参考资料》摘译过一些。读过第一篇《我们的会谈》后,毛泽东给江青写了个条子:“此件可看,很有兴趣……盛赞了中国人民的大(干)劲,要和平,不侵略,五十年内大有可为。”蒙氏的这种态度让毛泽东深感振奋。他马上又调阅了世界知识出版社3月就已翻译出版的蒙哥马利的一本谈论东西方关系问题的集子。尽管书中很少谈到中国问题,但蒙氏对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政策的批评,和应当把争取一个和平友好的中国作为西方国家最主要的政治目标之一的说法,还是让毛十分欣赏,他马上批示要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都读此书:“很有意思,(乃)必读之书”。^[43]

不难发现,内参资料主要是作为耳目,为高层领导在进行决策和了解动态时起到搜集信息、提供参考的作用,但是有时候它又像是向下面传达信息和指示的喉舌。比如《内部参考》,在实际运用中就曾同时具有“下情上达”与“上情下达”两种

功能。尤其是1957年以后，“上情下达”一度压倒“下情上达”，甚至出现扭曲事实的报道。这当然并非内参运作的常态。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互联网及相关传播技术的发展，部分内参更是已失去了传统意义上的某些功用，以至于有论者指出“内部性”与“参考价值”的相关程度已经有所改变。尽管如此，作为颇具中国特色的传媒体制和政治传播的重要组成部分，内参毕竟在当代中国的社会政治生活中，曾经、正在并将继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大作用。诚如有研究者所言，如能对内参善加运用，亦是加强党的治国理政能力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为此，就得对内参有更为清晰的了解和把握。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新中国六十年新闻事业史研究”（批准号：09AXW001）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沈阳大学文化传媒学院教授

注释

- [1] 政治传播的概念虽源自西方，且是伴随着最近几十年大众传播迅猛发展才出现的新名词，但相关实践及思想资源在中国亦有漫长历史，且同样丰富而有特色。步入20世纪，尤其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更是如此。一些尝试性的考察，可见于陈谦：《中国古代政治传播思想研究：以监察、谏议与教化为中心》，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1-242页。殷晓元编：《中国共产党政治传播研究》，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4-54页。
- [2] 从严格意义上讲，诚如魏永征在1999年11月10日的一次访谈中指出的，“内参不是大众传播，而是组织传播（Organizational Communication）”；但不管怎样，称之为政治传播，并尝试由此视角切入下一步的考察，应该是可以的。参见郭镇之：《新闻也要走向法制——访魏永征》，郭镇之、赵丽芳主编：《聚焦〈焦点访谈〉》，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33-234页。
- [3] [瑞典]沈迈克：《信息、决策和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朱佳木主编：《当代中国与它的外部世界：第一届当代中国史国际高级论坛论文集》，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第69-72页。黄正楷：《1950年代中共新华社〈内部参考〉的功能与转变》，硕士学位论文，台北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2006年，第1-76页。
- [4] 个别研究如硕士学位论文等虽亦涉及与内参相关的论题，但多较简略。此外偶尔亦见颇具史料价值的忆述和介绍，如下文所引卫广益、夏公然、张辛民等之文章即是。相对而言，近年最可注意的是尹韵公的尝试，见《论中国独创特色的内部参考信息传播工作及其机制》，《新闻与传播研究》2012年第1期，第4-14页；《邓小平与“内参”》，《党的文献》2012年第6期，第115-119页。
- [5]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第28页。
- [6] 转引自夏公然：《三年困难时期的内参》，《观察与思考》2001年第12期，第20-24页。
- [7] 新华社新闻研究部编：《新华社文件资料选编》第2辑（1949-1953），北京：新华出

- 版社，1981年，第334页。
- [8] 新华社新闻研究所编：《新闻工作文献选编》，北京：新华出版社，1990年，第262-264页。
- [9] 新华社新闻研究部编：《新华社文件资料选编》第2辑（1949-1953），北京：新华出版社，1981年，第488-490页。
- [10] 新华社新闻研究部编：《新华社文件资料选编》第4辑（1957-1961），北京：新华出版社，1981年，第172-174页。
- [11] 新华社新闻研究部编：《新华社文件资料选编》第4辑（1949-1953），北京：新华出版社，1981年，第182-183页。
- [12] 新华社新闻研究部编：《新华社文件资料选编》第4辑（1949-1953），北京：新华出版社，1981年，第175页。
- [13] 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第10册（1959-1960），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5年，第89页。
- [14] 卫广益：《吴冷西鲜为人知的“参考缘”及“耳目观”》，《中华新闻报》2002年8月31日。
- [15] 也有资料如张辛民即在回忆中说是11月份的事儿，实则有误。
- [16] 卫广益：《吴冷西鲜为人知的“参考缘”及“耳目观”》，《中华新闻报》2002年8月31日。
- [17] 卫广益：《毛泽东与大小“参考”》，毛泽东生平和思想研讨会组织委员会编：《毛泽东百周年纪念 全国毛泽东生平和思想研讨会论文集》中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第331-332页。
- [18] 从《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可以发现，他主要通过两种方式了解各地情况：一是地方向中央的报告，较为定期且正式，但容易“报喜不报忧”；二是定期刊物，包括中宣部编的《宣教动态》、中央办公厅编的《情况简报》，以及新华社编的《内部参考》和《参考资料》等。
- [19]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第11页。
- [20]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第10页。
- [21]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第17页。
- [22]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第35页。
- [23] 《本社各总分社布置各地记者采写关于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材料》，《内部参考》1953年2月11日。转引自黄正楷：《1950年代中共新华社〈内部参考〉的功能与转变》，硕士学位论文，台北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2006年，第64页。
- [24] 《江苏各地干部中官僚主义和违法乱纪的情况》，《内部参考》1953年2月25日。转引自黄正楷：《1950年代中共新华社〈内部参考〉的功能与转变》，硕士学位论文，台北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2006年，第66页。
- [25] 《江苏省委关于处理干部中的官僚主义和违法乱纪行为给本刊的信》，《内部参考》1953年3月31日。转引自黄正楷：《1950年代中共新华社〈内部参考〉的功能与转变》，硕士学位论文，台北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2006年，第67页。

- [26] 黄正楷：《1950年代中共新华社〈内部参考〉的功能与转变》，硕士学位论文，台北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2006年，第71-72页。
- [27] 卫广益：《毛泽东与大小“参考”》，毛泽东生平和思想研讨会组织委员会编：《毛泽东百周年纪念 全国毛泽东生平和思想研讨会论文集》中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第331-332页。
- [28]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70页。
- [29] 分别为杜勒斯在西雅图商会发表的攻击人民公社和共产主义的演说，杜勒斯在美国基督教全国委员会上发表的全面分析国际形势的演说，和美国“新教领袖们”通过的主张承认中国的声明。
- [30]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第740页。指美国前总统胡佛1950年12月20日在纽约发表的关于国际形势和美国对外政策的广播演说。
- [31]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第70页。
- [32]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200页。吴冷西时任新华社社长兼人民日报总编辑。
- [33] 卫广益：《毛泽东与大小“参考”》，毛泽东生平和思想研讨会组织委员会编：《毛泽东百周年纪念 全国毛泽东生平和思想研讨会论文集》中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第332页。
- [34]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523页。这篇文章题为《在我们的对华政策上的辩论》，毛泽东批示注意的是其中“垮台论”小标题下，开头的这句话：“‘一百万人委员会’说，‘北京政权现在并不能牢靠地控制住大陆。’工业产品、猪肉、棉花和煤的缺乏，反映出一种‘严重的经济危机’”。
- [35] 卫广益：《吴冷西鲜为人知的“参考缘”及“耳目观”》，《中华新闻报》2002年8月31日。
- [36] 张辛民：《“大读者”和新华社的国际参考报道》，《党史博览》2008年第4期，第5页。
- [37] 张辛民：《“大读者”和新华社的国际参考报道》，《党史博览》2008年第4期，第5页。
- [38] 《美国侵略者自己套上了绞索》，《红旗》1958年第8期，社论，开头便引用了毛泽东的这段话。
- [39] 张辛民：《“大读者”和新华社的国际参考报道》，《党史博览》2008年第4期，第6页。
- [40]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606-607页。
- [41] 《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9页。
- [42] 张辛民：《“大读者”和新华社的国际参考报道》，《党史博览》2008年第4期，第7-8页。
- [43]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9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219-220、222-223页。